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中国经济 转型 分析导论

伍 装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导论

伍 装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导论/伍装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81098-349-0/F · 311

I. 中… II. 伍…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202 号

责任编辑 谷 雨

封面设计 钱宇辰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FenXi DaoLun

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导论

伍 装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省句容排印厂印刷装订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5.25 印张 382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定价: 45.00 元

前 言

中国的经济转型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这一转型过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随着转型经济理论出现,学术界随之提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起初,对这一转型过程的分析被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后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介入,这一过程的分析又被冠之以“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等名称。在这里,我们将“中国经济转型”界定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本书将有关这一过程研究统一称之为“转型经济学”(因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无非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为转型过程的分析往往被视作一个临时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领域的问题,单纯地将中国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或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显然是一种有害的狭隘理解,所以,单纯作为自身的领域,转型研究是难以成功地发展的,“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①。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业已被纳入多元分析范式,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演进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

^①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中译本,第 12 页。

及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都对这一过程作出自己的解释。所以,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或者说,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综合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甚至目前只能是一种初期的探索。然而,科学的探索总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我们不仅可以从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得出对经济学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而且还可能揭示出一些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具有意义的理论逻辑。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涉及诸多领域问题的分析,显然,适合采用综合方法论,一种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只有经济学的革命才能推动经济学发展,而经济学的综合则无助于经济学发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综合恰恰从不同的视角以相互补充的方式推动了经济学发展,穆勒的综合、马歇尔的綜合和萨缪尔森的综合不仅未损害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反而让经济学在人们面前展开另一番全新的情景,在某种意义上,一部经济思想史可以被视作是一部经济学综合的历史。本书的研究不属于现存的某一分析范式,如果非要将它纳入一种分析范式的话,那它属于经济学综合范式。它的假设前提是综合的,即它并非始终如一地假定个人或一群个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有关章节通过对人类行为、预期效用函数等的研究讨论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变化,作者认为这种假设前提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现实;它的研究内容是综合的,经济转型的研究不同于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而更类似于市场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如果只单纯研究经济领域,则不仅理论上流于形式化,在政策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即是一个例证,中国经济转型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改革。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的,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被看作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动力不仅是经济主体预期收益与预

期成本的比较,也是生产力的扩张能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转型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集团的研究,作者既采用整体研究方法,也采用个体方法论,分析工具的综合使用服从于是否能够更好地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联系,使其能够更接近中国经济转型的真实过程,而不是仅仅追求逻辑的完美和形式化。

虽然如此,本书并非只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简单的复合研究,它始终紧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转换来展开分析,这是本书分析的主线索。第一,作者提出并阐述了“预期一致性原理”。围绕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可以揭示出这种大规模制度变迁为什么采用渐进式过渡方式而不采用激进式方式,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只能承担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在这种改革或转型中,作者提出,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协调或利益一致性是关键。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是社会文化、制度传统环境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和政府权力行为方式转变这三种主变量变化的统一,从这三个维度去考察中国经济转型,作者发现,这三个主变量的相互作用方式、演进的方向以及它们推动转型的动力皆与不同利益主体预期利益是否一致有关,即不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理解经济转型三个维度变换的轴心。再次,经济转型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国家(政府)、产权和意识形态在本书也给予了较充分的讨论。第三,政府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这个转型基本上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对于政府的预期收益的分析、政府预期收益与公众预期收益一致性的分析以及政府何以要改变其行为规则的分析,也成为本书的焦点。第四,如果将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转换过程,那么,反映和支配这种利益格局转换的制度、规则和秩序的形成、确立和变迁过程,就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自然博弈过程,也是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构建过程。

经济转型过程是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进化过程和国家理性构建过程的统一。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包围和冲击,显然,这种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竞争,既存在有利的一面,又存在负面影响。不可忘记,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作者深信,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逻辑”。那种过于强调西方研究范式和设置西式研究标准的做法,是否存在因循守旧和缺乏民族自信心之嫌。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和近来经济增长的奇迹无疑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形成的重点不在于批判而在于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对以往经济学范式的继承、改造、革命和综合,又包括如何摆脱西方文化单一中心主义和线性历史观,从而在现代经济学中确立一种“中国精神”。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1)
1.1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被选择	(1)
1.2 政治化产权体系与经济发展	(19)
第 2 章 经济转型中的两个特征向量	(39)
2.1 制度管制	(39)
2.2 制度竞争	(44)
第 3 章 经济转型的模式研究	(54)
3.1 全面制度管制的形成	(54)
3.2 经济转型方式的三种表述	(60)
3.3 经济转型的模式	(64)
第 4 章 经济转型中的利益行为和制度状态	(90)
4.1 利益行为状态:合作均衡和非合作均衡	(90)
4.2 分离制度和共同制度	(97)
第 5 章 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	(108)
5.1 概念界定	(108)

5.2	经济学的本质: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	(109)
5.3	预期利益一致性原理的基本内容	(114)
5.4	结论	(124)
第6章	预期利益一致性模型	(126)
6.1	政府和公众博弈模型	(126)
6.2	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一种诠释:进化博弈模型	(132)
第7章	经济转型中集体行动的逻辑	(145)
7.1	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	(145)
7.2	集体主义的经济学分析	(155)
7.3	经济发展和整体(集体)市场经济	(159)
第8章	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	(166)
8.1	为什么政治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变量	(166)
8.2	政治对经济的扼制和反扼制	(171)
8.3	政治的临界状态	(175)
8.4	政治观点和经济视野——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	(178)
第9章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行为	(186)
9.1	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规则的演变逻辑	(186)
9.2	政府为什么不相信市场	(198)
第10章	经济转型中的“规则失灵”	(214)
10.1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累积过程	(214)
10.2	第三种失灵	(229)

第 11 章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显规则和潜规则	(248)
11.1	解释中国经济的难点	(248)
11.2	隐性制度规则的基本特征	(252)
11.3	两种制度规则的作用机理	(255)
11.4	中国经济学的回归	(259)
第 12 章	经济转型与“变法规则”	(266)
12.1	为什么变法起源于危机	(266)
12.2	变法中集团博弈和可能的路径	(269)
12.3	一个历史经验	(273)
12.4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变法”	(278)
第 13 章	经济转型中的财产所有权	(285)
13.1	转型期中国财产制度演变的逻辑	(285)
13.2	经济转型期私有财产制度中的“原罪”	(298)
第 14 章	经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	(308)
14.1	市场经济改造价值观念还是价值观念改造市场 经济	(308)
14.2	中国如何崇尚市场经济	(328)
第 15 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349)
15.1	经济转型的动力学	(349)
15.2	经济转型成本的动态分析	(360)
15.3	利益集团研究	(370)
15.4	制度扩散	(379)
15.5	经济转型绩效分析	(387)

第 16 章 经济转型的运行轨迹	(401)
16.1 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	(401)
16.2 生产力和利益集团	(405)
16.3 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	(413)
第 17 章 经济行为、非经济行为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 ...	(419)
17.1 供求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外部效应	(419)
17.2 一个环保案例的研究	(420)
17.3 经济人、均衡分析和新古典模型的边界	(426)
17.4 两种制度环境和两种制度安排	(430)
17.5 结论	(437)
第 18 章 开放社会和经济转型	(440)
18.1 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能力	(440)
18.2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453)
参考文献	(464)
后 记	(478)

第1章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1.1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被选择

1.1.1 问题的提出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人们已有切身的感受,但是对于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往往将其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进一步的解释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们在主观上急于求成的心理。然而,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在这里涉及到两个较抽象的问题: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还是人们理性构建的结果?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进行哲学思辨上的纠缠,我们假定体制的形成是“演进”和“构建”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能导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我们进一步假定“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人类理性构建的产物”是合理的。其次,谁有能力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一种制度的构建当然离不开自然演进力量,但制度的自然演进力量是相同的,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走计划经济道路,应该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理性构建力量的主体,这种主体就是当时在中国社会中取得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一种集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恰恰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由于政治团体的成熟、社会知识结构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充分,使

得中国形成了一种中心力量,即足以构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最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动机究竟是出于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出于维护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这是作者将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对于选择制度主体的人性假定问题,有以下几种假定可供选择:①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公心而力主推进经济的发展。②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利而不得不推进经济发展。③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公心而选择计划经济制度。④假定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利而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由于没有更多理由认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就比普通人更有公心,或者说没有更多理由假定政治利益集团就一定不是经济人,那么接下来,一个可供选择的假定就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是出于自利(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选择计划经济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政治利益集团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由于不能假定政治利益出于公心,所以,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不得不选择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可获得最大化的收益。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出于自身需要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是否可能。一般地说,一个统治利益集团不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某种经济制度,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则处于政府可供选择的区间内。那么接下来需要论述的两个中心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如何最有利于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利益,以及政府选择计划经济制度如何成为可能。

1.1.2 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政治特征

(1)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已现出明显的与计划经济

体制相衔接的特征。首先,政党的核心作用和政治运动为轴心的社会运转方式,这些业已构成中央集权的基本雏形。“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就需要国家以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而这种渗透反过来需要谨慎地发展组织才能及认真地进行群众动员,以促使社会各阶层摆脱它们的狭隘观点,通过深入社会,中国共产党能够开发新的支持源泉。同时,它冒着集团不和的风险并受到影响。新领导人还面临从十几年大规模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中产生的任务——必须克服长期以来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人的继续反抗,必须振兴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必须恢复井井有条的政府活动。这一切将使中国共产党用尽其才能和智谋。同时,局势又创造了渴望和平与秩序的厌战民众对它支持的巨大源泉”^①。这种集中体制的形成是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来完成的,如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甚至抗美援朝等等。这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极大的支持源泉,并最终使其成为能够支配一切的政治权力中心。其次,从经济上说,在中国全面引入前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之前,已经具备了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通过肃清外国在华的经济势力,没收官僚资本,以及通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式,国营经济逐步建立。在稳定市场和物价的过程中,逐步统一了国家财政经济,包括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以及统一全国现金管理。通过逐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及农村中集体化道路,以集体经济来加强全民所有制经济。最后,从指导思想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也是一个必然产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根据这个理论的创造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

^① R. 麦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第70页。

义相对的社会经济形态,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而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列宁曾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直接概括为计划经济。建国之前,在论述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的思想。从当时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看,只有依靠集中掌握和调配的财力、物力,才能建立在经济战线上斗争的优势,只有采取消费品的集中管理,才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只有对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才能进行经济恢复和重点建设。

(2) 计划经济体制集权化的主要表现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的一切方面。首先,政府权力强化其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政府作为社会经济运转的轴心,是集中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名义下,通过集权这根杠杆的作用,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从制度的不同层面上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底层也是权力结构。其次,“井字形”的权力结构造成“井字形”的体制结构。从纵向层次上看,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通过指令性计划指标来运转的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体制,这种等级体制最终来源于权力的等级制。从横向层次上来看,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块状结构,即不同地区的企业和行政单位只对上级负责,下级听从上级的指挥,这种制度结构也是来源于权力的块状结构,即各地方权力只对中央负责。条块分割的“井字形”制度结构最终归因于权力的“井字形结构”。再次,意识形态的灌输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渗透和强化作用。一个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信息传输机制。这些除了通过政党所凝聚和发散出的力量的推动、约束和传递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意识形态化、伦理化和政治化,如将人们正常的逐利行为当作不合道德伦

理的行为来批判,在企业行为方面,宣扬“政府挂帅”,政治的推进力量也通过意识形态来进行,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等。

1.1.3 假定计划经济体制使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收益最大化

在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条件下,虽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存在着某种出于公心和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首先假定这个政府是既定无私的,显然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并且缺乏说服力。在这里我们可假定两种情形:一是政府的利益与经济发展方式或制度形式相一致或不一致;另一种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相一致或不一致。一般地说,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相一致的情形是少见的,也是瞬时的。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现过,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高潮时期,预期利益一致性多半是由于旧的统治集团腐朽、掠夺人民利益而人民又对新的政治利益集团充满期待才会出现的情形,既然这是一种少见和瞬时的情形,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种假定来解释中国人在相当长时期内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事实。剩下的情形就是,对于计划经济体制选择可能与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一致或不一致的假定。那么,为什么在建国初期,中国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是由于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与计划经济体制形式是相一致的,甚至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基本上是由于政治利益集团的偏好使然呢?这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能够使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利益集团的收益最大化。

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府获得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资源的权力。我们知道,权力是一种能够直接参与分配的工具,而当这种权力覆盖全社会并失去监督时,政府能够轻易地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权力的垄断性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政治

生活领域,而且也插入到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之中。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消除了竞争,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内消除了竞争现象。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垄断的最大化必然给这种权力的拥有者带来最大化利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能够给政府带来最大化利益,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政府获取最大化利益,惟一能够约束其最大化利益的只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即“蛋糕”本身的大小。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的信息传输是单向的,体现政府利益的指令性计划就是全社会的意志,实际上,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制度使得政府在获取最大化利益的过程中付出最小的成本。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偏好是单一的并且是被统治者塑造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可以尽可能地解决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尽管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即政治利益集团可以尽可能地了解公众信息(如通过调查研究和官方设置的信息渠道进行信息反馈),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公众则不知道政府想干什么和正在干什么。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绝对优”的信息结构。这种信息结构可以使得政府在既定期限内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在一种非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公众则可以通过与政府博弈的方式来限制政府获取最大化利益(在绝对信息结构条件下,公众丧失了进行博弈的基本条件或只具有极有限的博弈能力)。合理地假定公众是理性的,那么政府的权力在非计划经济体制信息结构条件下会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条件下,不仅公众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利益,而且政府利益集团最大化利益就会受到限制,或者说,为获得既定条件下的最大化利益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再次,公众的激励机制是非经济性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是受到批判的,惟一经济性的物质刺激是工人获得他们相对固定的工资,农民获得他们有限的“工分”,人